

# 抗 議

## 期五十二第

東亞解放之路(特載)

國無信則不立(特譯)

中日經濟合作應有之認識(特載)

和平反共復黨建國(特稿)

和平運動期間之民衆運動方法論(專載)

重慶的「六中全會」及其「宣言」

寇爾大使與中國共黨領袖談話之檢討

投機家來到遠東

蘇聯將在東亞乘機漁利

馬克思主義之崩潰(選載)

予欲無言集

葉公敢

西 芬

褚民誼

馮 遜

楊靜之

仲 平

劉鏐謹

鎮 南

木軍謹

毛一波

華紀懷

版出日一月二十年八十二國民華中

# 特載 東亞解放之路

葉公敢

本文係本社社長應東京東亞解放雜誌社之請而作，原文載該刊十二月號，茲特譯出，以餉國人。編者謹識。

七七事變以來，至今已兩年多了。在這兩年多的時期中，中國方面，全部精華，摧毀殆盡，至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尤其難以估計。就在日本，單是軍費一項，已經化費二百餘萬萬日圓，其他人民生命和物質的損失，亦是難以勝計的。上次歐洲大戰的損失，據專家統計，要把全歐洲人民百多年來的積蓄和生產，消耗了一半以上。中日兩國的戰爭，倘再延長下去，當然也非把這兩大民族百年來的積蓄全部犧牲了不可。似此同文同種而又有數千年文化密切關係的東亞兩大民族，今一旦遭此空前的浩劫，使兩國人民都陷於水深火熱之中，徒然造成增加歐美帝國主義者向東亞侵略的有利局面，那是多麼不智！近來日本有識之士，認為此種局勢，若任其延長下去，不僅兩大民族的前途深堪憂慮，就是整個東亞的和平，亦將永遠無從實現；於是有人倡導其「東亞新秩序」，「東亞協同體」，「經濟提攜」等的種種理論，以謀早日結束兩國戰爭，建立東亞和平，實現東亞解放。其用意之深遠，自為吾人所敬佩的。但在事實方面，中國人民常常顧慮，恐怕僅有理論而做不到實際，甚至祇作口號的宣傳以謀獲得中國的實益；那末，將來不但不能解放東亞人民，且唯有

增加兩大民族的糾紛。所以吾人除了飲服日本有識之士的卓見外，更願對此問題，以客觀的立場，略抒管見，以與友邦人士相研討。

首先，吾人亦深信要實現真正的東亞解放，其先決條件，必須東亞的兩大民族——中日兩民族——有其共存共榮之道。因為惟有這兩大民族密切攜手起來，纔能阻止歐美帝國主義勢力之侵入，進而建設和開發新東亞，使全東亞人民有獲得生活保障與安全之一日。自十九世紀下半期以來，整個東亞都受着歐美資本主義諸國勢力的控制。東亞諸國，尤其是中國，就成爲他們的經濟侵略殖民政策的主要對象。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逐漸脫離了歐美的束縛，自己也走上了資本主義的道路。但日本因爲國內經濟力量比較薄弱，又是資本主義發達較遲的國家，所以仍然處處受着歐美勢力的排斥和牽制。僅憑日本單獨的力量，無論在經濟、軍事、政治（主要的當然是經濟）各方面，要想抵抗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勢力，都是不可能的。惟有幫助中國先行解除封建勢力的桎梏，建設近代化的國家，與日本密切合作，建立堅強的東亞機構，而後纔能阻止歐美資本主義勢力。不幸中國因封建

勢力的強固和滿清政府的腐敗，非特不能像日本一樣勵精圖治以求復興，反而一天天的陷入了歐美資本主義勢力的控制之下而淪為次殖民地的國家。更不幸的，走上新興之路的日本，不能為整個東亞大局打算，扶助中國使之復興，反聯絡歐美資本主義共同侵略，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於是東亞兩大民族的歷史悲劇就繼續不斷地在近代國際史上一幕幕地開演出來了。不幸得很，這次的戰禍，便是其中最慘酷的一幕；不幸中之幸者，現在中日有識之人士，都深深地希望：「這是最後的一幕」。

日本自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後，對中國所進行的資本侵略，最具體的表现就是所謂大陸政策。大陸政策的目標：（一）征服中國——進攻中國、排除各國在華的利益；（二）征服東亞——統治東亞各民族，驅逐歐美在東亞的勢力；（三）征服世界——以東亞為根據地進攻全世界。祇就這點，很顯明的可以看出，日本近數十年來的行動，完全是資本主義侵略的行動，雖其殘酷性較之歐洲初期資本侵略非洲和美洲的時候或者稍遜，但在一般上講，在現代資本侵略中，恐怕也算是很可怕的了！這次的中日戰爭，從歷史發展來看，日本是要負很大的責任的。因為日本是加緊對華侵略，中國民族的抗日心理，便愈加激發，雖向來最愛好和平的中華民族，也不得不挺而走險。全中國人民都知道要真正實現東亞解放，中日兩大民族非以平等合作的精神攜手不可。現在中國既一再備受侵略，便不得不走上抗日的路途。所以中國這次的抗戰，分明是要求解放的一種自衛戰爭。只要日本肯誠意

的真正放棄過去對中國的態度，中國決不會不接受日本的善意，而故意的將兩大民族陷入深淵，讓歐美勢力永遠控制着東亞的。中國人民對於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侵略中國，向來深痛恨的；同樣，見到同文同種的日本民族不但不來互助提攜，反而襲着歐美侵略的故技，自然，從失望之後，更加痛恨了！看這次戰爭爆發以來，全中國的人民，對於戰爭所受的苦痛，不僅沒有發一聲怨言，而且大多數奔赴戰場，拚死抵抗，這種空前的悲壯史實，我想日本有識人士，總會深深地感動吧。如今「解鈴還是繫鈴人」。假使日本能立即澈底放棄其過去的大陸政策——即立即澈底放棄其侵略政策，並且處處以事實來證明，那末，中國人將毫無顧慮地與日本人攜手合作！

所以要真正的實現東亞解放，先決條件，須先解放中國，即須先完成中國的獨立自主，使成爲一個有健全能力的國家。惟有這樣，中日兩大民族間的糾紛纔可告終；同時，乃可與日本密切聯絡起來，打消歐美各資本帝國主義國家所加於東亞的束縛。這是極顯明的事理，日本的當局，也已洞悉到這一點，而確立了「東亞新秩序」，「東亞協同體」，種種理論。但中國人民，常不免發生懷疑。因自日本前首相近衛發表了「東亞新秩序」談話後，至今對於這所謂「新秩序」的理想如何；尚未具體確定，且日本政府的行動，還是繼續過去的大陸政策的推進。至於所謂「東亞協同體」，其內容則是「樹立日滿支政治經濟文化互助聯環的關係」，更似有把整個中國像鎖鍊般的被日本緊緊地鎖住的企圖。如果真的一旦中日

關係到了這個地步，試問中國還能稱爲一個獨立的國家麼？中國人民還甘心與日本合作麼？試看過去在東北，日本不是有商租權的麼？在東北，因爲日本獲得商租權，於是日人所居住之地，中國的警察權、經濟權，都隨之而喪失了。這不免使一個完全獨立自主的國家對人民無以自解。中國人民，何嘗不希望先進的日本之扶助，但是像過去的史實，是只有令中國人民感覺恐怖和失望。日本執政者倘仍堅持過去之侵略政策，則其言辭無論如何動聽，終是遮掩不住中國人民對於事實的辨認。即令日本以此種動聽的言詞，能夠收得一時宣傳上的效用，停止戰爭，變相的征服了中國，亦仍舊不能完全消滅中國人民的反抗心理，終止了兩大民族間的未來糾紛。何況日本即令獨佔了中國，亦無非促進日本與歐美資本主義的衝突；到了那時，日本因失却中國人民的同情，日本的國運亦很難樂觀吧？所以，日本要求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必先求中國的生存和發展。所謂中日兩國的「共存共榮」，便是這個道理。中國的人民，在這次的流血教訓中，能夠明瞭這種意義的已不在少數，只要日本多數人民，也能洞悉此種意義，那末，東亞的真正解放，便有實現之一日。

說到這裏，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吾人必須請日本人士深切注意的；就是日本政府近來所倡導的「經濟提攜」，中國人總以爲了日本過去政治的侵略，既然引起被侵略者的反抗，於是方式一變，而轉到經濟侵略了。所以日本在對華軍事的進展中，有所謂「華北開發會社」、「華中振興會社」兩大經濟獨佔的機關，也隨之成立了。這兩公司的最大任務，表面上

說是開發中國，但在中國人民看來，實是經濟侵略的中心機關，其目的在操縱中國的關稅金融、壟斷中國的生產和貿易。那末，所謂「經濟提攜」、「經濟合作」、「經濟單元」、「經濟集團」等等的動聽的名詞，都變作侵略的幌子了。這種以「軟性的大陸政策」來代替硬性的大陸政策，是中國人民最恐怕的，最不放心的！

日本人以爲中國人這種恐怕與不放心也許由於過去的成見，那末，不妨看看現在，日本有心人士不妨詳細調查日本現時在中國淪陷區內所進行的「經濟提攜」的事實，還是「提攜」呢？抑是「侵略」？那不須吾人曉曉置辯，可以一目了然。中國人民，在這個「經濟提攜」的美名之下，不要說生活無保障，且日漸過着牛馬生活，惟有呻吟與懷恨罷了。這因爲日本現在所進行的「經濟提攜」，不必說並不是從整個的日本人民的利益着想，而只是從少數的經濟侵略者的利益着想的；所以「提攜」的結果，受侵略的中國人民，當然只有更陷水深火熱之中，就是一般的日本人民，亦何嘗有利益之可言呢？自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國東三省的經濟，完全在日本的經濟的統治之下了；如以爲「經濟提攜」原是促進兩國人民生活之改善，則東三省的人民與日本的一般人民，在這數年來，其生活究竟改善了若干呢？這不是日本執政者故意造成此不幸局面，而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促使日本專向經濟侵略之途前進，徒然演成兩國間的悲慘局面。

上次歐洲大戰，分明是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使各帝國主義國家要求重新分配世界所由釀成的。大戰之後，歐

洲人民深感戰爭的慘酷，認識戰爭的可怕，以為從此以後，歐洲戰事總可力圖避免而不至於再發作了。但是事實呢？二次的大戰，又已爆發起來了。這一次的戰爭，也分明是與資本主義的發展驅使各國趨向於經濟侵略很有關係的。我們相信，經過這次戰爭以後，歐洲人民為要防止戰禍的再發生，必定要從防止資本侵略這一點上着手。我東亞兩大民族，深受數十年來兩國間慘痛歷史和歐洲事件的教訓，應該趕快覺醒，千萬不要將此人類悲劇，讓它永遠的演下去。

何況即令日本征服了中國，獨霸了東亞，但資本能力不免脆弱的日本，也決不能以單獨力量來開發中國經濟，勢非利用歐美資本以共同榨取中國不可。在這種局面之下，其結果必定日本反為資本能力雄厚的歐美所利用，中國固然是犧牲了，試問日本亦有何利可圖呢？而實際獲得利益的，還不是英美諸國嗎？日本的有識之士想也早已深思熟慮吧。

所以在經濟上，也同政治上一樣，唯有加緊助長中國的民族資本，使其實力雄厚，然後能協同日本的民族資本開發東亞。東亞自身既可自力開發了，則東亞解放還有什麼困難問題呢？

於此，可知中國人民並不是盲目地反對日本所主張的「經濟提携」。日本政府和人民，倘能明瞭中國人民的意向，能趕快提出真正以平等互惠為原則的「經濟提携」的實際辦法，我敢斷言中國人民一定能夠欣然接受的。這不僅中日兩大民族前途禍福所繫的問題，而實是整個東亞的命運所由決定的問題。我想，日本朝野有識之士，定能接受我的忠言的！

## 特 國無信則不立

西 荅

100

本文為日本東京東亞解放社所揭之「主張」，載於本年十一月八日發行之「臨時號」。譯者。

過去，日本曾有不少政府當局和政治家，一儘在口頭上返復強調「道義」這名詞，想把現實政治的無能掩飾起來，我們雖然並不認為「道義」就是「政治」，但至少也可以說，「道義」確是「政治」的一個先行條件。

日本對於中國事變的現實地位，是已經從通過過去二年的轟轟烈烈的戰鬥過程，進入最複雜最困難的政治上與經濟上的建設期了。就是如此，日本對內以及對外的當前的難題，也就毫無疑問的愈益加大。很明顯的，這個建設期的第一歩的表現，是在希望把東亞新秩序創造在中日協同之上的近衛聲明、和中國方面響應而起的汪兆銘一派的和平運動。可是我們要知道，此等表現決不是一片謀略，也不是出發於一時的衝動，乃是創生東亞新歷史的必然的發展。

日本國民，對於近衛聲明，斷乎不可認為是近衛公個人的聰明或良心，必須確認為全體國民的一大憲章。從而，要組成無論遭遇何種迫害與困難也不屈不撓的國家行動，纔能用以完成與真正的中國愛國者的協同。若是不然，一面在高調新秩序，一面又與隱在中國背後的列強妥協以求安，使新秩序的調子終成具文，那末，日本的「政治」將只是虛偽的「道義」，而被中國民族永遠疑恨，永遠輕侮。

古人有云：「國無信則不立」，何況是對於化中日之干戈為玉帛的此一大事呢？

## 特載 中日經濟合作應有之認識(下)

褚民誼

同時，因為中國的親英離俄，日本乃發動武力，造成九一八事變，創立所謂滿洲國，冀以滿洲國的典型逐步以日滿經濟一體的口號，引伸所謂中日滿經濟集體的統一，於是中日經濟關係形勢又更趨惡劣，而日本在國際外交局勢中陷入了困難的局面。即以中國貨幣改革而論，實由英美相助推行，進而入於英人之掌握；日本於此理應翻然改圖，真誠合作，但實際仍迷於武力，不顧中國自身之意旨。再以一九三五年所提中日經濟合作的理論觀察，更有一絕大的阻力，這阻力就是所謂「日本工業中國農業」這一口號。在這口號之下，

日本以為中國農業可由日本以技術的指導，以農業生產品大量售予日本，同時並易取需要的工業品，另一方面設立中日貿易協會，企圖傾銷日貨，優勢於中國市場；這樣中國變了消費者，經濟利益完全為日本所得，且將中國永遠置於農業社會組織之下，而毫無生氣，我們知道，一個國家由農業到工業，是必然的趨勢，也是必有之要求，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永遠停滯於農業社會階段，除非是殖民地或次殖民地。中國當然不能永遠處於殖民地地位，永遠是他國工業原料品之供給者；固然中國原料品可以供給他國，但必須有自主的主權來發展自己的工業。所以中日經濟合作也須以平等互惠的原則，來顧全中國自己的建設需要，即日本也應願意如此纔可以開展到共同繁榮的目的。但是這第三時期之中，日本曾一面以武力作種種要求的後盾，一面以片面的經濟合作理論來企圖獨佔利益；縱使這幾年來互有經濟考察團的派遣和往來，而實際上依舊格格不相入，反不如英國的積極幫助解決中國的貨幣，得到一般人民的同情。同時，在歐洲方面，英

俄正以「民主」二字為媒介，漸次接近，予中共以勾結蔣介石之機會，西安事變之後，乃急速形成親英聯俄政策，終而造成這一次中日空前的大戰。

我曾經說過：凡事不平則鳴，平則互利；而所謂平，尤必須有平的事實。現在日本軍事佔領區，就華中來說，隨着軍事而開展的，是一種所謂華中開發公司；地域的廣大，權益範圍的優越，一切超過了國際公法所允許的條件。在這獨佔的公司下，又發動了各種事業獨佔的小公司，這些公司的資本號稱雖然相當的大，但實際上的資金並不多，只是將事變以前所遺留下來的財產或物資暫維現狀，而這些財產又並不全願及中國商人的意志，而藉軍事佔領以沒收下來的，也有中國某種商人願意加入合作作為資本，而財產的估價又非常之低。我們根據報告，在淪陷區內不但沒有純粹中國民營的公司，甚至一個比較大的商店也有被壓迫的可能。凡此種種都不能謂為平，不能引人民以信仰。其結果淪陷區的工業依舊逃避於租界逃避於西南。事實是勝於一切的雄辯，我們希望今後的經濟合作必須有真正互惠互利的辦法與方案。

由於二年來戰爭的覺悟，過去歷史的檢討與事實失敗的教訓，日本已經表示真誠的合作，改善過去辦法，中國自然樂於接受，但具體的方案尚有容待於各種專門家來研究，來制定。不過我覺得，中國產業之所以落後，影響經濟的開展，最大的原因是在均勢制度的確定，和日本與其他列強的種種協定。因之，中國沒有自主的經濟政策，一任處於被動的地位。第二，是中國產業界有依附政治的思想，而沒有支配政治的思想。因為中國過去產業界借政治勢力來操縱市面，

壓倒同一產業的團體，結果引成了官僚利用巨商以發財。於是巨商官僚連合一氣，官僚可以低利通融資本，而普通商人反得不到這利益。因為官僚愈發財，巨商愈入於官僚的掌握，普通商人也就不開展，其結果一切企業無辦法，而巨商大賈之結合，也沒有真真在企業上謀發達，而只是投機。我們只要看中國市場投機風氣之盛，就爲了這緣故。反觀歐美情形與歷史，那就大不相同。他們可以和政府要求，也可以和官吏鬥爭，他們握得民主政治的要義，更把握着民主主義之下的民生經濟。所以，遠有歐洲中古時代的反對貴族，爭取民主，近有美國產業界可以支配政治動向的諸般歷史和現狀。我們如果能反省一下，當知殉身於獨裁的錯誤。第三，是中國產業界的沒有遠大眼光，唯小利是圖，中國的工業近年來極有蓬勃的氣象，但均因不能腳踏實地而失敗。譬如，每種實業新興的時候，必大家效倣，競爭，不肯集中人力，財力，智力，謀整個的開展，結果因爲東一個廠西一個廠的緣故，大家都失敗了。這就小的而言。資本大些的，就極力作表面的擴展，沒有謀技術上的進步。使生產品改良，只注意在量的方面，而忽略在質的方面，結果，其失敗之慘，馴至無人敢作實業企圖的刺激，這只要看上海中日兩國所辦的棉紗事業就可以知道。所以捷克的拔佳、美國的福特，都以一小工業而成大企業家業，中國則有很大資本的企業，而終歸於失敗。

上面所述，雖爲中國經濟上的病態，也應使中國商人覺醒的，但主要原因還在沒有獨立的經濟政策和國際均勢制度的束縛。因爲我們需要國際投資，却没有方法去利用，反被外資所利用，我們需要技術合作，却没有方法去利用技術，更沒有注意到中國經濟的動力是中國的勞工。所以國際投資

變成了供給原料與消耗商品，技術的指導變爲事業的管理。好像增加生產與開發經濟資源只有資本和技術，勞工是非主要的條件。須知資本與勞工乃是生產的二個主要因素，技術是把二者聯繫成具體的經濟狀態。俗語說得好：「出錢出力，各分利益。」那末所謂經濟合作，我們既是出錢，又是出力，如何能使人家的利益多，我們的利益少，甚至毫無利益而被人獨佔呢？這是每一個中國人民的信念，而且希望日本人民認識和了解的。

由於資本勢力和技術三者的平衡和三者之不能偏廢，是中日經濟合作，必根據平等互惠的原則，和構成經濟問題的三個主要因素來研究一具體方案，乃爲上策。我們不能因爲談經濟合作而牽動領土主權行政的完整，我們必須就純粹經濟問題的立場來謀取中日兩國的共利，然後可以達到兩國共存共榮的目的。

我們指出了中日經濟合作上難以接近的歷史原因，與中國自身沒有經濟政策的錯誤，我們就想到，中國國民黨主席汪精衛先生於民國二十二年在南京有言曰：「沒有相當的國力，不但不能與日人言抵抗，也不能與日人言親善。」換句話說：「能自存始能共存，不能自存，則不能共存」。最近日首相平沼氏亦有言曰：「凡爾塞和約充滿了勝敗的偏見和功利思想，其結果遂招致了今日世界的局面，而陷於連自己所創設的國際聯盟也不能維持的窘境。日本這次和平條件則以道義觀念代替功利觀念，對於中國不僅無勝敗的偏見，並且有同憂患共安樂的誠意，這樣東亞的永遠和平便能夠確保。」所以中日經濟合作，必先解決中國的民生問題，實現民生主義，完成民主政治，然後中日能永久和平，能共存共榮。這就是中日經濟合作問題上，中日兩國人民必有的認識與必有的努力。

(完)

# 和平反共復黨建國（特稿）

馮 適

## 五 爲什麼要復黨

這段文字剛巧寫在重慶所召開的「六中全會」之後。我們這裏有一個汪主席所領導的國民黨，重慶那邊也有一個蔣介石所玩弄的國民黨；這對於不明白國民黨的現實狀況的人——尤其是黨外的人，將不免發生誰是誰非的懷疑：究竟那一方面纔是真正的中國國民黨呢？這是我們首先要說明的一個問題。

誰都知道，中國國民黨是 孫總理創建的。總理創建國民黨的目的，在於集合同志，從事國民革命；而國民革命的目的，消極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極的在把中國造成三民主義的國家。這種目的，意義是十分明顯的。我們可以根據這目的來辨識重慶蔣介石的國民黨，它是否還是 總理所創建的國民黨？易言之，蔣介石的國民黨，其所行所施，是否合於 總理的目與主張？

就國民革命的消極目的即求中國之自由平等而言；此次對日抗戰，在戰爭發動之初，未始沒有爭取國家的自由平等的意味；但在抗戰兩年以來，一方面，中國不能戰勝日本，已是盡人皆知的事實，也就是說，中國已不能由抗戰來爭取自由平等；一方面，日本在兩年的戰爭中有了新的覺悟，認爲非但不能征服中國，而且不應該征服中國，願意與中國息

爭言和，平等相處，以圖共肩復興東亞的大任；這種情勢的轉變，是指出中國已可以由和平來爭取自由平等了。只要達到中國能自由平等的目的，即無悖於 總理創建國民黨從事國民革命的初衷，理至明顯。但是蔣介石的國民黨，過去既強調抗戰爲惟一的爭取自由平等之道，到了抗戰一敗再敗的幾於全國毀滅的現在，仍然強調無底的抗戰，是其本旨并不在爭取國家的自由平等，當不問可知。試問蔣介石的國民黨還是真正的國民黨嗎？

就三民主義的本質而言：民族主義主張中華民族要獨立自主，而蔣介石的國民黨則主張倚賴英美，更不惜聽命蘇聯；民權主義主張民主政治，而蔣介石是把整個國民黨的事業由他一人包辦，把整個國民黨的國家政權由他一人獨裁；民生主義，主張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尤其顧及人民的衣食住行等一切生活，而蔣介石的國民黨則把全國的金融資本集中到少數私人的囊橐中，對於人民的生活，則拿焦土政策和無底抗戰來任意摧毀，使全國人民都淪於生死不得其所的悲慘境况之中。蔣介石的國民黨還有一毫合乎三民主義嗎？

其次，就黨的本身能力而言，蔣介石的國民黨更已不是原來的國民黨了。西安事變以後，隨着蔣介石本人的投降共產黨，國民黨的實際能力也就完全爲共產黨所操縱；一面，蔣介石爲了保持在共產黨挾持之下的身份，自己又從國民黨



中抽出一部分的「特殊勢力」組成藍衣社來與共產黨相拮抗，拮抗之不成，則相與狼狽為奸。所以，現時蔣介石的國民黨，已經不是原來的國民黨，而是藍衣社和共產黨的混合物；重慶政府已經不是國民黨的政權，而是藍衣社和共產黨的分贓機關，總理所創建的國民黨已被蔣介石一手斷送了。

然而，蔣介石只能斷送國民黨的形式，斷送不了國民黨的主義的精神；蔣介石只能斷送他自己及其走狗，斷送不了忠實的國民黨同志。黨是由黨員組織而成的，真正的國民黨員既未被蔣介石一網打盡，所以在脫出重圍的國民黨同志自然會把純正的國民黨重行光復起來。復黨的目的是由救同志而救黨，由救黨而救國。復黨之後，還是遵照 總理的主張，從事國民革命；還是要爭取中國之自由平等，建設三民主義的中國。

汪先生接納海內外本黨同志的要求，鑒於時局的實際需要，便於本年八月廿八日在上海召開本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復黨的基礎工作算是完成了。時至今日，理智與事實都告訴我們：中國國民黨已經脫却重慶的挾持，重行在這裏建樹起來了。

我們之所以積極復黨，除了為恢復本黨的本來面目與自由，也就是恢復本黨的生命之外，還有幾個迫切的原因：

第一，在重慶方面的多數後方同志。多數皆知抗戰必敗，久戰必亡。可是他們在兩重挾制之下，不能實現自己的主張，並且不能提出自己的主張。在汪先生還在武漢的時期，他們屬望汪先生指導他們的理論，代表他們的意見；現在他們眼見走到山窮水盡的絕路，不能挽救國家和黨，並且不能自救。我們為實現和他們相同的主張，需要恢復本黨來實

際行動；為解決他們的切身痛苦，也需要恢復本黨作他們將來的歸宿。

第二，淪陷區域的同志，親眼看見失地無力恢復，游擊難收效果，親眼看見人民受着共產黨的排擠殘殺，受着痞棍匪盜的蹂躪，求生不得，束手待斃；他們又都看出惟和平外交纔能回復國家的土地、主權，人民纔能再度中國人的生活。但是他們散處各方，缺乏思想的指導與工作的方針，所以需要把本黨恢復起來，使他們有了依歸，而後纔可集中力量，共同努力。

第三，要打破共產黨的暴戾和獨裁勢力的橫行，再建國家於戰爭的廢墟之上。是萬分艱巨的事業；必須有健全的黨，發動全體黨員，推動全體民衆，纔能肩起這萬分艱巨的大任；故復黨更有其急切的需要。

## 六 復黨後的革命精神<sup>(註)</sup>

本黨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而恢復了黨的生命與自由，並由大會議決了新的政綱與宣言，已詳載於本刊第十七期「大會特輯」，茲不詳述。但有一點往往被人誤解的，就是本黨對於時局的兩大主張：一是「和平」，二是對日協調，取消獨裁與反對共產黨。

關於第一點，有人說：「抗戰是革命的，和平是妥協的，不革命的。」說這種話的人，不但不知道為什麼要抗戰，為什麼要和平，並且不知道什麼是革命。要判別一種政治運動是否是革命的，不能只問形式上是激烈或是妥協，最要看它的實質，是否適應國民的需要，是否適應時代的發展。只要能夠適應國民的需要與時代的發展，則無論在形式是激烈

或是妥協，都是革命的；反之，便是妥協的，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就對內來說，國民革命在必須掃蕩障礙的時候，戰爭自不可免；如果國民的需要與時代的發展已經到了必須統一而且可能統一的時候，則統一必求之於和平。所以總理在九年回粵策動北伐，是革命的；十三年北上促進和平統一，也是革命的。對內如此，對外何獨不然！為保全國家的自由平等，在和平無可維持時，不得已採取戰爭以自衛，則戰爭是合乎革命需要的手段；及至戰爭已無需繼續，必須以和平結束戰爭，且同時可以獲達戰爭的目的，則革命的需要便在和平而不在戰爭。進一步說：任何國家，無論對內對外，莫不以和平為立國之大本，戰爭不過是不得已而採行的手段。只有好亂成性的共產黨徒，纔會歪曲革命的眞諦，內則煽動階級鬥爭，外則挑撥世界大戰；他們所進行的，不是社會革命，而是社會毀滅，他們所期望的，不是世界安全，而是世界擾亂。其實，連共產黨的老家的蘇俄，雖然暗中挑撥戰爭，口頭上也還不絕的高調和平，而自己又終始不肯直接牽入戰爭的旋渦；所以，即使共產黨要拿革命二字來反對和平，自己也還無話可說。至於蔣介石之污蔑和平為妥協為屈服為投降，其根本用意，只不過要拿抗戰來支持他個人的權位，一面又想禁止別人來談和平，而由他來玩和偷和；那是更不足道的了。

前面已經說過，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為什麼中國不自由不平等呢？因為中國是一個積弱的國家，現代國家的條件還未具備。革命的目的，即在充實此種達成自由平等所必需的條件。為充實此等條件，必須有和平建設的環境；而為保持和平建設的環境，及為掃除和平建設的

障礙，有時不得不訴諸戰爭。和平與戰爭，形似矛盾，實則在國民革命的最高目的上是一貫的。戰爭是和平絕望之後的不得已的結果，也就是為謀恢復和平的不得已的手段；從而恢復和平正是戰爭的目的，也就是建國的充決條件。去年本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提出「抗戰建國」的口號，並不是說惟有無底的妄戰纔能建國，乃是一面指出在抗戰中不要忽略建國的任務，一面又指出抗戰只是手段，建國纔是目的。該次大會宣言中并鄭重聲明：「吾人之本願在和平，吾人之最終希望仍在和平」；又說：「未到最後關頭，會以絕大之決心與勇氣從事於忍耐；既至最後關頭，則不得不以絕大之決心與勇氣從事於犧牲。」這種精神是對的！在不得不戰的時候，革命者應以絕大之決心與勇氣，奮起抗戰；而到了可和的時候，革命者也應以絕大之決心與勇氣，進行和平。此次大會宣言追溯上次臨全大會宣言既定的和平本旨，適應時勢的需要，而把「抗戰建國」的口號易為「和平建國」。因為到了現在，非和平無以建國，而戰爭則已失去建國的作用了。所以，由「抗戰建國」到「和平建國」，目的是一貫的，精神是一貫的，革命的意義也是一貫的。我們為了「建國」而「和平」，為了「和平建國」而積極復黨，這種運動乃是有組織的革命行動，是完成國民革命的一個極重要的階段。

關於第二點，有人說：「復黨便復黨好了，何故同時對日協調呢？何故取消黨章中的獨裁制呢？又何故反對共產黨呢？」我們回答這三個問題，正好根據三民主義來解釋。

一、民族主義是主張民族獨立，不是主張民族敵對。對於壓迫我民族的他民族，自然要反抗她；而對於以平等待我

之民族，非特不應反抗，而且要和牠聯合以共同奮鬥。這是總理明白昭示的。抗戰之初，我們以為日本是要滅亡中國的，所以不得不奮起抗戰；現在已經知道日本不但沒有滅亡中國的心意，而且鄭重聲明願與中國親善提攜平等合作，以謀兩民族之共存共榮，則在日本，侵略的意識既已改變，在中國，抗戰的對象也已消失。日本民族既以平等待我，我當與之聯合，與之協調。為實現民族主義，應該如此，為實現總理的大亞細亞主義，更要如此。至於日本歷次聲明的對華和平親善政策是否出於誠意，自有事實可考，不是一語可以抹殺其必為心懷叵測的；在並未發覺其虛偽的事實以前，我們沒有理由可以武斷她必不以平等待我。所以現時為適應時勢而對日採取協調的態度，並不違反民族主義，還可以說是為求民族主義之實現。

## 二、民權主義的根本精神是民主，原是反對獨裁的。

總理從事革命，對於主義與政策之決定，因其獨特的雄才大略，足以領導羣倫，所以毫不推讓於他人，而由一己任之；但是對於革命事業的推行以至革命政權的執管，一向是把責任與權限分給大眾負擔，絕不專擅。到了蔣介石，他是以為自己的才幹比總理高明，所以在黨章中增設「總裁」而由他來擔任；在他任了本黨總裁之後，無論黨的方面或政的方面，一切都被他一人獨裁了；即在景況已經蕭條到無以復加的現時重慶偏安政權中，他仍不忘獨裁的迷夢，把軍事、政治、經濟等大權全盤握於一人之手，連地方行政也要直接把持。蔣介石是把獨裁當做帝制，把重慶政府當他的小朝廷了；其為惡為毒，亦何待言！此次大會宣言，有云：「數年以來，黨已失去民主集權之制度精神，而且益趨於個人獨裁，此

實為一切敗壞之原因」。語其大要：因個人獨裁之變本加厲，而黨人離心，黨務渙散，質能退避，宵小倖進！因個人獨裁之變本加厲，而黨與民衆日益隔閡，民意沒由表現，民力沒由集中，所謂民意機關，不過獨裁者掩耳盜鈴的御用工具罷了；因個人獨裁之變本加厲，而貪官污吏蠅營狗苟，裙帶姻婭狼狽為奸，把整個政治弄得昏天黑地，把整個社會擾得雞犬不寧。全國人民處於獨裁淫威的高壓之下，連做順民的餘地也沒有，簡直是牛馬奴隸；其去民權主義的精神，何止幾千萬里！所以此次復黨之後，首先廢止獨裁制度，恢復民主精神，藉以掃除一切敗壞的根源。

三、至於為什麼反對共產黨，這在本文的第三第四兩段已為敘述，茲不詳舉。總之，共產主義既不適宜於中國，共產黨的行動更只有為害於中國。單就民生主義來說，共產黨雖口口聲聲要談社會革命，高喊解決勞苦大眾的生活問題，而其實際行動，在過去剿共期間，滋擾猖獗，甚於流寇，被糜爛者十有餘省；在狂調抗戰的現在，更以無底妄戰與焦土政策兩項毒藥，差不多把全國的血肉摧毀殆盡了。凡共產黨勢力所到之處，只見到流亡載道，民不聊生；倘是再要任她橫行下去，摧毀殆盡的國家元氣將永無蘇轉之日。所以，要安定民生，非剿滅共產黨不可。

綜結上述，復黨後的本黨之所以主張對日協調、取消獨裁及反對共產黨，乃是更從實質上發揚本黨的三民主義與真正的革命精神；同時可以知道，蔣介石在重慶所玩弄的國民黨，它究竟有沒有主義，它的主義是什麼，或者它是不是革命的。

（註）本節材料，大部分採自林柏生之「展開革命的和平反共復黨建國運動」。

## 專載 和平運動期間之民衆運動方法論(上)

楊靜之

民衆運動是要民衆，不是推開民衆；

民衆運動是領導民衆，不是利用民衆；

民衆運動是爲民衆，不是教民衆爲我。

在今日和平運動期間，民衆運動的目的，最主要的是在於同化民心。民心同化之後，其消極的效果，爲減少推進和平政策上的摩擦；積極的效果，爲增強推進和平政策的動力。民心被同化的程度達於最高度時，可以撥毫釐而舉千鈞，使民如歸，無往不屆；反之，民心未被同化，或表面上雖若同化而實際上是由於壓力所逼服者，縱然不起磨擦作用的障阻，而在推進政策的行程上，終不免有振萬鈞無以動毫毛之憾。所以民衆運動的真實成績，可就其同化民心的程度一事來決定它。

所謂民心，不用說，乃是一種抽象的概念，不是什麼具體的事物。但是這

種僅是抽象概念的民心，却具有極大的「力」的作用。政治家有了這種力，便可以推行其主義與政策；否則，無論主義如何高明，政策如何恰當，也只會有一籌莫展。

民心這種「力」，有如物理上的圓運動的力一樣——它有兩種：一種叫向心力，一種叫離心力。向心力是向着運動中心而作用的，離心力則與運動中心背道而馳。當然，民衆運動所要的是民心的向心力，不要它的離心力；還要把離心力變爲向心力纔好。這種希望，在物理上是不可能的，但在政治上並不是一定做不到，而且是要做到的。怎樣就可以保持并增強向心力，更可以把離心力變爲向心力呢？換言之，即是如何使能取得民心呢？

取得民心的方法，可以分兩方面來講：一是對內的，一是對外的。對內的方法，主要在鞏固運動的中心，或者說，在於健全運動的主體。因爲運動主體健全，纔能支持并推動強盛的運動勢力；在物理上，也須圓心有強大的力，纔能發生強大的向心力和制止強大的離心力。總理說過：『得民心的方法很多，最要緊的是要革命黨員人格高尚，行爲端正，先使人民信仰；人民有了信仰，便發出力量』；就是這個意思。對外的方法，主要在增強向心力的作用，或者說，在於開闢民衆來歸的道路。因爲運動中心縱然鞏固，運動主體縱然健全，若是民衆根本不知道鞏固與健全之所在，便不會發生信仰，也就不會發生力量。其次，民衆縱已發生信仰，且已發生力量，但是民衆本身是不會完全瞭解使用力量的方法的，甚或加以誤用，則

結果不僅使力量消耗於無益，或且生出  
不利的結果來。所以，對於民衆，必須  
開闢各種道路，指示其行徑，使不知道  
的民衆充分知道，使已知道的民衆依照  
最適合的情形走進來。

現在且把上述對內與對外的兩個方  
法提供一些比較具體的意見。

## 二

對內的方法，是要健全運動主體。  
要運動主體健全，第一須運動份子  
純粹。關於這一點，總理在每次對黨  
員訓話時，差不多沒有一次不拿這個問  
題來告誡同志；這就是因為份子純粹與  
否關係運動成敗太大的緣故。因為份子  
一複雜，則在不同的份子之間必有磨擦  
；在物理上，磨擦是一種阻障物體運動  
的最不好的作用，在政治運動上，磨擦  
尤其是一種極壞的東西；這是盡人皆知  
的，無庸細述。要避免磨擦，惟有先求  
份子的純粹化。要解決份子是否純粹這  
個問題，惟有施行檢查。

我提出「檢查」二字，也許有人要覺

得驚異，至少要說這是一件麻煩的事吧  
？其實並不如此。「檢查」的意思，不是  
「檢舉」，也不是「檢察」，它不過是內在  
行爲的一種「自省」工作而已。個人也應  
當自省，何況負有推動全國民衆運動使  
命的運動主體？而且檢查工作不是一定  
要行之於形式，只要方法得當，也可在  
無形中，在短時期中，一舉完事。一次  
完事之後，還可以亦還需要隨時行之。

要檢查的是些什麼事呢？在團體方  
面，是立場之相同與否；在個人方面，  
是素質之健全與否。因為立場不同，則  
主張互異，這便免不了磨擦。因為素質  
不健全，則思想、人格、行爲、能力等  
必有缺陷，這便削弱了團體的運動能力  
。檢查工作在於找出其中的實際情形，  
以便權衡輕重，預爲防範之計，以免發  
生了不良的結果之後，再來圖謀補救，  
那是消耗太大了，或且無法補救。可知  
檢查工作是防患未然一勞永逸的。

在政治活動中，有所謂黨派的現象  
；現在我提出檢查份子純粹與否這問題  
來，也許有人誤會，以爲是檢查份子的

派別的多少的問題。這就錯了。我們要  
檢查的，在團體方面是份子的立場。如  
果立場完全相同，見解與信仰完全一致  
，則不問其原來派別如何，即可稱爲純  
粹；在個人方面，是份子的思想人格行  
爲能力等項。如果皆是思想純潔，人格  
高尚、行爲端正、能力充實的，亦不問  
其派別，可稱之爲純粹。倘是主持檢查  
之人，徒以與我同黨同派爲純粹之標準  
，那末此人就根本未明瞭檢查的意義，  
他本身就應得先行矯正。這一點是萬分重  
要的。

至於檢查的方法，不必拘泥於一定  
的形式，只要能達到檢查的效果，什麼  
方法都可採用。例如履歷登記，生活調  
查、工作考核、思想談話等，無論正面  
的或其本人，或是旁面的就其環境，皆  
可斟酌採用，以達到明瞭其立場（見解  
、信仰）與素質（思想、人格、行爲、  
能力）爲度。

檢查工事的最大願望，自然是希望  
全體份子的立場皆是一致的，素質皆是  
健全的；但在事實上往往沒有絕對的可

能。故檢查後的結果，份子的立場總不免有相當差異，份子的素質亦不免良莠不齊。如果差異和不齊的程度並不甚大，自然不生何等重大問題；倘是差異和不齊的程度是很大，那又怎麼辦呢？

對於立場不正或素質不良的份子，最理想的辦法當然是剔除。但是理想到底是理想，實行起來十九是行不通的。所以在消極的剔除辦法之外，還該有一個積極的辦法。

這個積極的辦法只有「訓練」。

本來——我們可以說老實話：參加政治活動的份子之中，無論如何是免不了夾有投機份子的，另外，還有勉強份子。投機份子為謀個人出路而來，勉強份子為糊裏糊塗而來。在這些份子的身上所含的危險性，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我們即使不加檢查，也可以決定多數份子有加以訓練之必要了；而在詳細檢查之後，當然更可按照其缺陷的實際情形，予以最有效的矯正與培育。不僅如此，在投機份子勉強份子之外，對於素質較差的份子，無論其為人是好是壞，也當使其有及時修養的機會。就是說，訓練的目的，不僅在改正錯誤，尤在增

進知能。要使運動主體健全，訓練工作較檢查工作尤為重要。前者是積極的，後者是消極的；我們要多做一些積極的工作，因為積極工作最能減少磨擦，而消極工作往往相反。

訓練的方法，當然也不必拘泥一端，而且也不必要用一個訓練班來訓練。有些人，可以由一件小事便叫他受感化，可以用一句話便激發了他的良心；自然也有那些橫也教不好豎也教不好的人。對何種人用何種方法，只要你用的得法，可以在無形之中收得訓練的完全效果。最要緊的，是負訓練之責的人，第一要有以身作則的精神；有此精神，便能叫受訓練的人先存信仰，有此信仰，訓練就容易收效。如果這一點做不到，必將勞而無功。我相信，請汪先生演講或訓話一次，較之受三個月的講堂訓練要有效得多；請高級工作人員一面以身作則，一面循循善誘，結果亦必比那曉諭式的告誡為有效。至於一般非情感性的知識及技能等的灌輸，那末用集體教育的辦法，或者用小冊子傳佈，自無不可，且屬必要。

為求上述工作易於收效起見，我寧得在運動主體的組織中，有特設一個「人事部」的必要。人事部不僅負責檢查與訓練二工作的策劃及推行之責，並且是一個調整人事與積蓄人材的機構。這個機構的作用，好像是人體內的肝臟之與血液，它能夠破壞舊的血液，又能夠增生新的血液，使整個循環系中的血液永久保持着清潔與健全。

對內，如能照上述做去雖未必就能辦到份子完全純粹的地步，至少對於健全運動主體的一點上，是會收相當成效的。只要運動主體一分一分健全起來，我敢斷言：民衆的信仰必隨之一分一分增高，決不會反而減退下去。一般從事政治活動的人，往往只注意「對他」工作，而忽略「對己」工作，以致不是垂於失敗，便是走錯了路；國民黨的革命，經過了幾十年之久，還未能完全成功，這種對人不對己的積習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所以我率先提出這個對內的問題。尤其因為現時大多數的工作同志是集於一處的，在實施上也覺得切要而便利。

## 重慶的「六中全會」及其「宣言」

仲平

一四〇

一  
 渝蔣所召開的「六中全會」，十二日開幕，二十日閉幕，歷時九日，共舉行會議七次。此次「全會」，適當抗戰景況益趨沒落、國際形勢愈演愈惡之際，但在歷時九日的七次會議之中，未見討論到中日和戰的問題或如何支持戰事的問題，亦未見討論到適應國際形勢的外交問題；所討論(?)的，只是一些雞零狗碎的小節目和一些不着邊際的空名詞，而把和戰與外交兩件大事輕輕地由蔣氏個人的開幕辭與閉幕詞一說了事。我們把它所議決的全部案件試一翻閱，不禁對此「全會」有「何必召開」之感！

在開會的前數日中，我們確知曾有不少高級同志提出「反共」及「決定和平方針」各案，而主席團却一律攔壓，不予交議；我們又確知此次「全會」是在警備森嚴的管束下舉行的，任何委員的行動與言論皆受極端限制；至於「全會」的實際狀況與所發消息之不相符合，自不待言——其實，參與此次全會的委員究為若干，以及是在何種式樣之下參與的，恐怕連這些人自己也互不相知。照我們推想起來，此次「全會」的專制情況，較之過去由蔣氏一手包辦的三全大會，必是有過之無不及。

本來，整個重慶政權一直是被壓制於蔣氏獨裁之下，無論政的方面或黨的方面，根本沒有民主之可言；任何會議，都不過是獨裁者借以欺騙外界的御用工具罷了。而蔣氏本人則又被挾持於共產黨，由共產黨在旁面操縱獨裁的動作；蔣

氏本人名義上雖是至高無上的獨裁者，實際上乃是至卑至賤的赤色奴隸。在重慶政權之下的在朝人物與一般人民是做了奴隸之奴隸，受着雙重的壓迫；若再加中國共產黨受制於蘇俄第三國際來講，蔣介石正也是奴隸之奴隸了。在此情形之下，重慶黨權與政權的任何設施，當然談不到自由；可是這些失却自由的人們尤其是蔣氏，自己還不肯承認失却自由而強調自由；強調自己是怎樣堅強怎樣有辦法；無疑的，這種強調，惟有更加顯示其奴隸的姿態而已。

二

最最具體的奴隸性的表現是「全會宣言」。該宣言的內容完全是空虛的，毫無創造的實質。全篇文字可分三段：首段和末段是對於前方將士之勇敢、戰地民衆之堅忍及各國援助之熱心，表示感謝之忱；皆是老生常談的例行文字，毫不足取。當中一段是舉述所謂「當前要計」，計分三項：第一項是重申五全大會宣言中關於救國建國的十項政治的精神綱領，舊題新抄，亦無何等意義可言；第二項是報告明年召開國民大會的決議案，這似乎是一件新鮮，但所謂明年，爲期尚遙，與目前的諸多迫切問題毫無關係，真所謂遠水近火，徒令人痛感畫餅不能充饑而已；第三項是繼續強調抗戰，至於抗戰的真確理由與抗戰機構的實際狀況，則一字不提，僅謂「總裁在開幕詞中已明確揭示，已爲全國一致所接受」云云，這種本末倒置的推諉方法，尤可謂荒唐達於極點！

綜觀「宣言」全文，看不到一句切合實際的話，也看不到

一件切合實際的事；只是一篇空無所有的酬世文簡罷了。由於此一「全會宣言」的空無所有，我們可以推知重慶政權的任何方面亦必空無所有；假使重慶政權的現實狀況果如它所宣傳的如何堅強及如何有辦法，那末此次「全會」便不會無結果而散，「全會宣言」也不至於言之無物了。

此次「全會」結果之所以空無所有，有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未能脫却奴隸關係的束縛。元來，開會以前的一兩月來，國共兩黨的磨擦已經發展到行將火併的程度。有不少尚具良知良能的同志如元老派等，鑒於共產黨的囂張跋扈，看出國家不亡於日本將亡於共匪，因此主張及時反共。開會之初，他們曾一致提出若干件關於反共防共的建議；有不少委員也正是為參與討論此等議案而出席的。但是提案交到蔣介石的主席團之後，終因蔣氏本人不能掙脫對於共產黨的奴隸關係，以致全部提案都被擱壓不提了。我們知道，共產黨是以挑撥戰爭擾亂和平為務的，對國內如此，對國際亦然；現在「全會」既不能討論反共，則和戰問題、外交問題等，當然聯帶不能討論；「全會」既不能討論此等重大而迫切的實際問題，試問「會議」的內容除了空無所有之外還會有什麼？「宣言」的內容除了言之無物之外還能說什麼？我們所看出的：此次「六中全會」乃是「奴隸集會」，「全會宣言」乃是「奴隸宣言」。

## 三

奴隸也不是容易做的，尤其是在動亂之世。因為在動亂之世，他的主人往往多疑、多忌、多恨、多怒，此等情感的發洩，無疑的，首先是以奴隸為對象。他高興笑罵便笑罵一頓，高興鞭撻便鞭撻一頓；可憐做奴隸的人除了肉體上遭受

創傷之外，連神志也被攪得紊亂不清了。

我要指出一件事實，證明現時的重慶當局實已達於神志錯亂的程度；而這件事實還是「全會宣言」。

前面曾經舉述的「宣言」中段所謂「當前要計」的第一項，它說：「抗戰國策實決定於二十四年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有十項宣言，實本黨政治綱領，亦即抗戰目標」。這真是一大笑話！二十四年雖說是在國難期間，但當時中央尚無抗戰的意念與準備；在整個五全大會中並沒有明白提出「抗戰」二字，有何理由武斷五全大會實已決定「抗戰國策」？又有何理由把那次的「政治綱領」武斷為「抗戰目標」呢？此種驢假虎皮之計，適足顯示其本身的心勞日拙而已。我們再把五全大會宣言的十項綱領看看，愈知此次「全會宣言」的不倫不類了。

五全大會宣言中說：「本大會鑑於歷史之教訓，願以救國建國同時致力之意義，昭示吾全國同胞，期相與為同德同心之努力；爰舉今日「要計」有關於建設國家挽救國難者，為吾同胞詳切陳之：

- 第一，崇道德，以振人心。……………
- 第二，興實學，以奠國本。……………
- 第三，弘教育，以培民力。……………
- 第四，裕經濟，以厚民生。……………
- 第五，慎考銓，嚴考績，以立國家用人行政之本。……………
- 第六，尊司法，輕訟累，以重人民生命財產之權。……………
- 第七，重監察，勵言官，以肅官方而伸民意。……………
- 第八，重邊政，弘教化，以固國族而成統一。……………
- 第九，開憲治，修內政，以立民國確實鞏固之基礎。……………
- 第十，恪遵總理遺教，恢復民族自信，確立正當之對外



關係，以保持國家獨立平等之尊嚴，而達世界大同之目的。……」

這十項綱領的內容，根本不含「抗戰國策」的意味，烏可強為假借？此一綱領自有其正確的意義與價值，但決不能指鹿為馬，說這就是「抗戰國策」。如果此一綱領可以稱為「抗戰國策」，則任何政綱任何教義甚至任何法規皆可稱為「抗戰國策」了；如此則「抗戰」還有什麼意義可言？

本來，在二十四年前後的國難期間，中央一面鑒於外侮之深堪痛恨，一面又鑒於國力不充，抵抗不易；因此決定「救國建國同時致力」的原則，從改革政治培植國本着手以充實國力，國力充實之日，亦即救國完成之時；上面所舉的十項綱領，便是實行此原則的初步計劃。而當時對於日本的侵略，主張「一面抵抗，一面交涉」，這與「救國建國同時致力」的原則也是相吻合的。因為救國之道不止一端，抵抗是為救國，交涉也是為救國；易言之，抗戰為救國，和平也是為救國。救國與抗戰雖有聯帶關係，却非全部相同之事，理至明顯。可是重慶當局却硬要強不同為全同，此等作為，若非有意曲解五全大會宣言的本旨，必是神志已告錯亂無疑。

#### 四

其次，我們還可以舉出事實來證明重慶當局非但把五全大會宣言加以曲解，而且還故意違背它：

在上述十項綱領的第十項中，原是這樣說：「決定國際關係，應以整個國家命脈與永久民族利害為對象，而不為一時之變化與感情所牽引。吾人為今日中國之國民，對國家對世界有當盡之義務，對祖先對後世有應負之責任。故吾人今日唯一秉不偏不倚之固有德性，以無畏無惑之精神，權衡

於國家百年真正之利害，以定決策。明於國家定律及人定勝天之意義，而奮力於自助自救。……吾人今日唯有以自力奮鬥，求自國之生存；亦願本尊重和平互助之民族先性，與並世各國圖共存。既不欲偏向任何國家，亦不欲妨害任何國家。……吾人處此國難嚴重之時期，所持以應付危局者，亦惟有秉持「總理」人定勝天與「操之自我則存，操之在人則亡」之二大遺訓，以最大之忍耐與決心，保障我國家生存與民族復興之生路。……」

這段言詞，明白指示着：吾人應本自力奮鬥之精神以自助自救，不可偏倚任何國家而把生死存亡之權操之於人；又明白指示着：吾人應為國家民族的百年之利害打算，不可為一時之變化與感情所牽引；又明示指示着：吾人的本願原是尊重和平互助以與各國圖共存的。但蔣介石及其重慶政府是怎樣呢？第一，它把整個國策倚向他國，一時倚英，一時倚蘇，一時倚美，從不稍思自助自救，對於合乎自力奮鬥精神的以直接交涉為原則的和平運動及其主張，非但不予接納，而且多方加以摧殘。第二，他為了共產黨的蠱惑與挾持，為了蔣氏個人的好惡，為了一時的國際情感，不惜把整個國家命脈與永久民族利害作孤注之一擲，而不顧及國家民族的百年之計；他是以國殉黨，以黨殉政，以政殉獨夫，以獨夫殉共產黨。第三，他否定和平，否定互助，否定共存；因此它反對和平，反對中日平等互助的可能性，反對中日共存共榮的原理。他反對一切，所以五全大會宣言的宗旨也在反對之列；如果引證總理遺教來批評，它也是反對總理的。

重慶政府為什麼要反對一切呢？理由也很簡單；因為共產黨是反世界反人性反一切的，重慶政府既是共產黨的奴隸，自然也依從他的主人而反一切了。

## 寇爾大使與中國共黨領袖談話之檢討

——自密勒氏評論報——

據路透社十一月九日電稱，謂英大使寇爾在其最近逗留重慶期間，與中國共黨領袖陳紹禹（王明）及國民參政會共產黨代表秦邦憲（博古），曾舉行一次長時間之談話。對於這則新聞的含義，恐怕很少有人曾加過一翻適當的思考。

就外交慣例而言，一國大使與其駐任國之反對黨舉行談話，雖不能謂為失當，然亦頗屬罕見。吾人恐誰都不能想像：美國駐法大使會與法國共黨領袖作「長時間之談話」；或英國駐美大使會與美國共黨領袖勃勞德（Earl Browder）舉行談話，蓋此均為不可想像之事也。

當然，有人會說，中國之情形與他國不同，因為目下中國共產黨，正與蔣介石將軍及國民黨共同担任政府之工作。然而，在事實上，重慶政府並非國共兩黨之結合體。共產黨員，雖有幾位在政府之中担任着名義的職位，但共產黨却從未能與國民黨享受平等的權利。在重慶，共產黨尚能勉強存在，然中國他

處之共產黨員及共產主義者，仍被目為非法份子。有若干共產黨員要求享受獨立政黨應享之權利，因而被捕下獄。故日方最近所傳之國共關係緊張之消息，並非毫無根據。就常識判斷，亦可看出國共之合作，乃一時權宜之計，且雙方始終互相猜忌。再者，在政府政策之決定方面，共產黨的言論，是沒有多大力量的。

既然如此，寇爾大使何以要在重慶與共黨領袖舉行談話？關於此一問題，或有人會作如此之猜測：即該項談話之舉行，事先已獲得國民政府之同意與贊成；不然即係閒談，並無重要性質。然此種猜測，恐無多大理由。蓋寇爾大使，恐未必有那種與致去聽共產主義的那套理論啊。

那末，寇爾大使和那些在重慶之粉紅色共產黨員舉行談話，目的究竟何在呢？關於這一問題，祇需將下面的事實一加思考，便可獲得一個解答。我們知

道：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其自身並無政治勢力，因為在那孤立的「赤」區以外之共產黨，均無足重輕也。但共產黨却具有其重要性，這是因為該黨是斯丹林政治機構之延擴，是莫斯科外交部之非正式的分部，並且是克姆林宮之政策的傳達者。

最近有若干事實，表示日蘇將有舉行談判的可能。該項談判，可以斷言，將決定中國共產黨未來的政策。斯丹林與希特勒之一次政治談判，竟使歐美各國之共產黨黨員，一改其過去之反希特勒的態度，而對其一向所擁護之布爾喬亞民主主義，實行反對的宣傳。中國共產黨，對於這種暗示，自然不會不接受的。所以在德蘇協定簽字以後，毛澤東便公開主張改變對德關係。假如明天蘇聯竟與日本做了「朋友」，誰有理由可懷疑毛澤東不會和他的歐洲同志譴責英法與「愛好和平的」德國繼續作戰一樣，來非難蔣介石對「愛好和平的」日本繼續抗

戰呢？

目下欲拉籠日本的，不僅莫斯科，此外尚有英國。英蘇二國，刻正密切注意對方行動。英大使之所以與重慶之共黨領袖作「長時間之談話」，其目的不外是想從他們口中，探聽一點關於莫斯科今後對於中日戰爭之政策的趨向而已。

然則英國之計劃為何呢？近幾時，一般人均相信英國將對日本作大大的讓步，希冀結束中日戰事。關於此點，本月十二日美聯社會將倫敦新政治家雜誌（New Statesman）所載之一項有趣的報告，傳至上海。該雜誌載稱：英國曾向日本提出解決中日衝突之建議，該建議內容，為英國許可日本佔領中國部份的領土，且願意支持汪精衛之南京政府，而日本應給於英國的報酬，則為尊重英國在華南之利益。該報告更謂英國並準備領導日本，進攻蘇聯。但經美聯社訪員向倫敦消息靈通方面探詢，則謂官方並無此項正式意念，至於在私人談話中，或曾有所提及，亦未可知。

據字林西報駐東京訪員報告，謂英

大使克萊琪於十一月十號曾與日本外務次官作一度之長談，關於天津問題及歐洲之局勢均曾談及。顯然的，目下正有某種事項，正在醞釀之中，因十一月十二日之東京新聞亦載稱：日本外相準備與英美商談一般問題。

就日本在與英美討論各項問題時的那種模稜兩可的態度觀之，日本之所以申言欲與英美談話者，其目的是要向蘇聯暗送秋波。再者，東京讀賣新聞，關於此點亦有所暗示。該報謂，當最近美國對於蘇聯遠東政策之注意逐漸增加之時，美國輿論均有一個共同的感覺，即日本若受美國壓迫過甚，恐將被迫與蘇聯成立協定。

又據同盟社東京十一月十一日電稱，謂日本與美國共往來之各大企業家，業已決定組織一個研究會，專門研究與明年廢止日美商約有關之各項日美間之問題。同時，華盛頓日本使館，頃亦宣稱，謂數項有關美國在華利益之案件，業已解決。日本準備賠償路德教會遭日機轟炸所受之損失，並竟開放楊樹浦區

城；廣東綏蘭（譯音）美國教會遭日本海軍轟擊所受之損失，亦允賠償；此外沙面美人之被扣船隻，亦將賠償以現金。該使館更謂：美國在中國他處之教會所有財產之損失，亦將迅速進行調查，並予以解決。

外交戰目下正在進行之中。莫斯科刻正向英美討價還價。而英美兩國的利益關係，亦並不完全一致。日本很希望英美兩國之紛歧逐漸增加。英美若真會分裂的話，則日本便可以在那出價最高的一國，大做其一筆交易。

目下局勢中，這一切的變化，均表示日蘇之談判，頗有舉行之可能；此項談判於日蘇兩國，均屬有益。關於這點，上文業已論及，茲不贅述。若以德蘇合作因而斷送了波蘭這個先例觀之，則東亞兩大強國之談判，自然會使中國以及在華利益業已遭受損害之列強，感覺異常的恐懼。日蘇談判，則正在東京與莫斯科兩地進行之中。有趣的新聞，就在目前了。

## 投機家來到遠東

鎮 南

外交戰爭之在今日，已成爲最風行的國際活動了。而每個外交談判總是和交易所裏講斤論兩的生意一樣，把國際舞台形成五花八門的市場。用正常的商業手段來經辦外交，本沒有絕對可以營議的地方；但是我們現在要特別指出，在國際市場中，有一個專門做投機生意的黑市客人，他不但投機取利，而且還擾亂市場。這個黑市客人便是蘇聯。

在歐洲，蘇聯做成一筆一本萬利的生意，同時又把歐洲市場鬧個天翻地覆。英法蘇三國談判本是一宗正常交易，但是蘇聯始終是爭長論短的從中搗亂，因爲假使做成的話，蘇聯是要平均分擬資本的。然而德蘇談判這筆交易，一眨眼便做成了，那是爲什麼呢？就是因爲蘇聯可以一本萬利。德蘇兩國所進行的一幕，實在是黑市市場的投機。由於此一黑市的變化，整個歐洲市場便擾亂起來了。

嘗到甜頭帶着猶笑的投機大家，注視到遠東來了。據最近消息的報道，在日美兩國正在進行調整國交關係感覺棘手之際，忽然又生出以蘇聯爲中心的兩條平行的談判：一是日蘇談判，另一是美蘇談判。這兩個談判，表面上雖以經濟性質爲主，其實裏面所含的政治的意義是很重要的。這個政治的意義可以把歐洲的教訓拿來說明它。

德蘇兩國在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以前，本來是對立的。英國與蘇聯也一向是貌合神離。但是因爲英國與德國的衝突日甚一日，她們都感覺妥協之無望而各各拉攏蘇聯以圖威脅對方；英國走明路，德國走暗路。就是因爲明路暗路之互相迴

避，天賜蘇聯以大事投機的機會。蘇聯既有所挾持，馬上拿出黑市客人的手段來了。它算算明路不及暗路的本小利大，於是和德國的買賣是做成了。德蘇不侵條約締訂，在歐洲撒了一把野火，教德國與英法廝打起來，而她則乘火打劫，完成她的暗市勾當。一面，德國和英國雖都明知吃了蘇聯的虧，英國吃明虧，德國吃暗虧，但是吃明虧的英國依然無法報復，而吃暗虧的德國也只有敢怒而不敢言。

在遠東，日之反蘇，原與德蘇之對立相同，而美國與蘇聯也是英蘇一樣一向是貌合神離的。但是現在因爲日美衝突有不可減免的趨勢，似乎也在做法英德兩國各拉蘇聯以威脅對方了。可是我們要大聲疾呼：蘇聯給德國吃的虧，快要臨到日本頭上；而蘇聯給英國吃的虧，快要臨到美國頭上。蘇聯在歐洲挾持英德衝突以自重，操縱其間，而歐戰於以爆發，現在蘇聯又將挾持日美衝突以自重；苟一操縱，遠東也必因之橫遭塗炭。

遠東的最大主人是中日兩國。我們要警告日本和美國：遠東問題之解決，只有以中日問題之解決爲基礎。纔能發生遠東問題的合理性，纔能奠定遠東的和平。日美兩國只有認識中國之獨立自由爲遠東和平的更要支點，纔能覺得日美談判的正當途徑，纔能調整遠東的國際關係。若是忽略了上述二點，則日美談判將永無和諧的出路，而日蘇、美蘇談判的結果，惟有讓蘇聯再做一筆一本萬利的投機生意。惟有把日美自身鑽進牛角，攪起和歐戰一樣的遠東戰爭而已。

# 蘇聯將在東亞乘機漁利

——自密勒氏評論報九十卷十二期——

John Ahers 著  
木軍譯

日下整個的亞洲，都帶着恐懼與焦灼的情緒，注視前莫斯科。在不久的將來，蘇聯是否要使這地球上最大的一洲，也成受可她那新生的力量呢？在德蘇成立諒解及歐戰爆發以後，蘇聯更開始實行她的新擴張主義，並使整個的歐洲，均感受到牠的壓力，她把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以及立陶宛，都幾乎變成牠的附庸國。現在她正將壓逼芬蘭，使她作極大的讓步。並且據若干事實的表現，她不久即將轉移其注意力，集中到黑海及巴爾幹諸問題方面。那末，在黑海及巴爾幹諸問題解決以後，蘇聯再將有何舉動呢？

自從滿蒙邊境諾蒙亨區域日蘇間之非正式的衝突，因蒙諾亨停戰協定之簽訂而宣告停止以後，蘇聯在亞洲，竟獲得了一個全新的國際地位，至於蒙諾亨停戰協定，將來究於何方有利，目下尚難斷言，蓋因諾蒙亨事件，尚未獲得根

本之解決也。最近蘇聯在歐洲曾獲得了不少的新領土和新軍事根據地，並且在她目下的邊境以外，還建立了許多勢力範圍，在歐洲既然有了這樣大的收穫，要希望她在亞洲以維持現狀為滿足，當然是辦不到的。蘇聯恐不久即將在亞洲——尤其是遠東，也和她在歐洲一樣，來覓獲一些利益。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

當蘇聯開始在考慮遠東問題的時候，她勢將提出那些經濟的以及類似經濟的各項問題，這些問題，都是歷次日蘇邊境衝突的導火線。在遠東，有許多政治問題，往往披上一件經濟的偽裝，同時真正的經濟問題亦慣常透過政治問題而站在政治問題的前面，所以亞洲的經濟問題，一向居於政治問題之先；然在歐洲則不同，經濟問題通常隱匿在政治的帳幕之後。在不久的將來有被蘇聯提出可能的各項經濟問題，大概是北庫頁

島的日本油權問題、西伯利亞沿海的日本漁權問題、西伯利亞大鐵道及中東鐵路轉運問題。還有些更重要的問題，如中東鐵路最後一宗降價問題、日蘇商業問題、中蘇貿易及中蘇交通問題、以及其他等等問題，均有提出的可能。

在蘇聯人民看來，日本在西伯利亞領土以內，以及沿岸海洋之中所享受的探油和捕魚之特權、目下已經到了應該廢止的時期了。日本獲得這兩種特權的時期，是遠在三十五年前，日俄戰爭（一九〇四—一九〇五）結束時，樸次茅斯條約（Potsmouth Treaty）簽訂的時候。那時日本以戰勝國的地位，向戰敗國的俄羅斯，要求在俄國領土內，享受這兩項特權。這種要求，顯然是侵害了俄國的主權。而且這些特權都不是互惠的，因為日本在她自己領土之內，從未將類此的特權給予俄國或其他第三國。日本在蘇聯領土內所享受的特權，實

違背蘇聯目下的立法，並與蘇聯之經濟大相抵觸。其他各國及私人，在蘇聯所享有類此的特權，早已廢止了。

過去數年間，日蘇間所有歷次嚴重的衝突，均由日本在蘇聯所享有的油權及漁權所引起。日本海軍久已把庫頁島之油田，視爲自己特殊的油藏。所以牠對於日本採油公司，因蘇聯的作祟而引起的諸多困難，表示極端的憤恨。東京時時譴責蘇聯，謂蘇聯妨害日本採油工作，且使其業務無法擴展。而蘇聯則非難日本，謂日本不遵守漁權讓予條約中所規定條款，且違背蘇聯之勞工法。蘇聯人民時常使北庫頁島之日本採油人員，在生活及工作方面，感受極大的困難，乃致一再被迫停止開採。

至於漁業方面，近數年來，亦糾紛時起。差不多每年春天，日蘇間免不了發生漁業的糾紛。這種糾紛祇可加以暫時的解決，而這種解決，至多能維持一年。可是，最近兩三年，日蘇漁業糾紛，愈演愈烈。去年夏天，幾有引起武裝衝突之勢。那一次糾紛，結果還是蘇聯讓步。但是明年春天，蘇聯還會讓步麼？斯丹林用了威逼的方法，已使半個歐

洲，都給他許多特權，他還會讓日本仍在他的領土以內享受任何特權嗎？恐其未必。

日本常常表示，若失去在蘇聯領海的漁權，便不能生存。的確，日本有許多捕漁企業，及日本北部沿海的大部居民，多半賴以爲生。自一九〇五年以來，日本漁業的狀況，起了根本的變化。往昔日本在蘇聯領海內所捕的魚數，在其全國所捕魚之總數中，佔有相當大的比例，但目下的比例却非常之小了。在過去二十五年中，日本建起世界最大的捕魚工業，但現在在日本每年所捕之魚數，若與七大海洋任何一處所捕之魚數比較，日本祇有三分之一。蘇聯一向頗不明白，爲何日本的捕魚者，在每年春間，冒着引起戰爭的危險，越過其享有捕魚權的範圍，從事捕魚。其實，此乃其原因之一。蘇聯認爲尚有其他政治與軍事的原因，也是對的；所以蘇聯頗不願意讓日本永久享有此項漁權。

滿洲方面之中東鐵路問題，到現在尚未徹底解決。在一九三四年，蘇聯因日本佔領滿洲，及有被德國進攻的危險，在這雙重壓力之下，將中東鐵路售與

日本，並撤退所有路員。然最後一期路價，至今尚未付清。故蘇聯可隨時以日滿未能遵行售路契約中條款爲口實，宣佈該約無效。若日本見到此種危險，並鑒於蘇聯國際地位日臻堅強，而突然償付最後一期之中東路價，是無足驚異的。

但縱然如此，中東鐵路問題，仍不能認爲完全解決。

自日本接收中東鐵路以還，蘇聯實際上已不能利用該路轉運滿洲里及海參威之間的貨物。滿洲境內所有的鐵路，運費均異常昂貴，且條例亦十分苛刻。這一點顯然是日本有意與蘇聯爲難，使蘇聯不能利用滿洲之鐵道，作爲西伯利亞各部之間以及西伯利亞至黃海及華北各大商埠之間的運輸工具。但在目下，日德間之商運，必需假道西伯利亞及蘇聯本部方能維持，所以日本對於蘇聯的要求，勢難再加拒絕。不但中東路價應予以清償，即蘇聯要求利用滿洲所有之鐵路，日本亦不便拒絕考慮。

歐戰爆發以後，德日間海上航運中斷，因而西伯利亞大鐵道突然變爲蘇聯的一件極重要的資產。日德兩國現均異

常重視這條鐵道。滿洲本年擬運往德國之大豆，總數達一百萬噸，但目下尙無法起運，蓋因德日海上交通業已中斷也。除大豆而外，日本尙有其他出口貨，均無法運航德國。再者，日本與滿洲所需之德貨，來源亦告斷絕。日本所需之德貨，大部爲機器、工業用品、以及發展日本本部及亞洲大陸之鋼鐵、金屬、探礦、化學等工業所需之原料；此項原料且無其他代替品。若日本無法獲取這些原料，祇需兩個月，便會感覺恐慌，而勢必把她那發展滿洲工業之五年計劃，以及其他各種工業計劃，全盤改變。

德國被英法封鎖以後，日德兩國便想借重蘇聯之西伯利亞大鐵道，作爲主要的運輸孔道。在先，日本與西伯利亞鐵道當局，談判此項問題，然毫無結果，於是又向蘇聯政府接洽。蘇聯即應允先作試運數次，於是便有幾宗大豆與豆油自滿洲運至列寧格勒。但是這一點，絕不能誤認爲是問題的根本解決，而德日亦不能因而有恃無恐，認爲彼兩國間之商運，已無問題，蓋蘇聯並未與日德成立運輸協定故也。從技術觀點上看來

，德日靠西伯利亞大鐵道，來維持兩國之商運，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其他日滿貨物，姑置諸不論，專就一百萬噸的大豆而言，即需裝載十萬輛貨車，每次單程平均至少需時兩週，則蘇聯必須專撥貨車一萬輛，繼續不斷替日本運輸大豆。但蘇聯運輸制度，並不十分完善，且沒有許多車輛，可供應用。至於日本和德國，也未見得有剩餘的車輛；縱然有之，亦無濟於事，因爲蘇聯的路軌較闊，德日的車輛竟無法行駛的。

在這種情形之下，若蘇聯果真願以極大的努力幫助德日解決此項運輸的難題，其所索的代價，恐亦可觀。德日若僅願以運費作爲報酬，蘇聯未必即能滿足。單就對日本而論，蘇聯大概會將日蘇之經濟問題、如漁油問題、中東路問題，以及其他各項問題、與西伯利亞運輸問題，一並提出，與日本討論，而加以根本的解決。

數月前，日本報端曾登載一個建築反共大鐵道的計劃，據稱這條鐵路將以直隸海峽爲起點，經過山西大同、蒙古、新疆、帕米爾高原、阿富汗，直達波

斯、然後再由依拉克直達巴爾格達。像這樣荒誕不稽的計劃，若日本果欲利用蘇聯的西伯利亞鐵道，當然非放棄不可。並且日本想欲深入蘇聯與中國之間的中央亞細亞的念頭，大概也非打消不可，若不然，日蘇仍免不了衝突。今日的蘇聯，正想控制其接壤的國家，使蘇聯的安全獲得更大的保證，當然不願意日本在西伯利亞之南部邊界再建立許多新的軍事根據地。蘇聯尤其不願日本深入中國內地，更不會聽任日本切斷那條由新疆經過大戈壁、內蒙古、直達甘肅滿洲的中蘇商業路線。

就上述一切情勢觀之，日本若欲與蘇聯改善關係，對於目下兩國間有關經濟的懸案，勢必作大大的讓步。若她仍舊保持以往不妥協的態度，不但西伯利亞大鐵路不能利用，恐怕還要遭受蘇聯的壓迫。斯丹林及其政府，顯然是在利用外交的勝利增加對內的威望，假如他在日本面前，仍舊繼續退讓，那末，他們最近從歐洲得來的威望，恐怕也保不住了。

x x x x

## 馬克思主義之崩潰

(選載)

毛一波

十三 俄國的黨鬥

工黨主義的理論家索勒耳 (Sorel) 在他所著的一本小書中說：「一切政黨，都為搶奪官職而組織的」(見「馬克思主義之解體」)，這個語句，真是十二萬分地對啊！我們研究政黨在英國最初之起源，我們又研究政黨之成長到新俄羅斯那樣，我愈覺得索勒耳的話，是千真萬確。凡是一種政黨，他們雖表面自命為代表某一階級，目的在為某一階級謀利益，其實他們不過是藉某階級人民之羣力，而利用之去作爭奪權利的工具的啊！譬如在今日世界上招牌最新的政黨，恐無過於新俄羅斯之布爾什維克黨了；他們雖然自稱為革命的政黨，自謂為代表俄國無產階級之利益；但事實告訴我們，布黨是破壞了一九一七年十月之偉大的社會革命，是和國際帝國主義者妥協(自勃萊斯脫和約以來)，壓迫着本國的無產階級(如禁止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容許國內外資本家之掠取等)是爲了維持政黨獨裁的權利，而犧牲了俄國人民之一切利益。

政黨既是野心者之一羣組織起來去搶奪權利的，於是在政黨內部，常不免有互爭權利的事實發生。因爲爭做首領，爭發大財等等，是那些組成政黨的分子之必然的要求。很顯明的例，仍是新俄的布爾什維克黨。布黨本是掛着馬克思主義的招牌，但實際並不是真正的革命黨，因此，他便和普通政黨一樣，是爲了爭奪權利而組織。他在一九二一年，便發

生了黨的内訌。那時，新經濟政策雖尚未實行，而布黨黨員，因爲待遇不平等，便大起衝突。哥倫泰女士率領一般下級布黨黨員，藉口另有一種更切近「無產階級專政」的主張，要求產業歸職工會管理；同時，托羅斯基也藉此攻擊列寧；後來哥倫泰居然因此得了個很好的位置，安靜地到波蘭去當公使，但他的黨徒「工人反抗派」還是憤憤的不滿。自列寧死後，黨中又起衝突，下級黨員會秘密組織「勞工真理團」從事反抗運動，而著名布黨黨員，前最高經濟委員會長薄格達諾夫也因有參加此種運動嫌疑而被當局之布黨首領逮捕。直到今年「一九二五」一月，陸軍總長托羅斯基也被免職了；據說因爲托羅斯基主義與列寧主義衝突。其實，甚麼主義衝突，都是空話，地位問題，才是他們相互衝突的所在。蓋自列寧死後，齊諾維埃夫與托羅斯基派爭奪取領袖地位，當時齊諾維埃夫與加米奈夫等乘列寧新死，指定留谷夫爲人民委員評議長，托氏對此極爲憤慨，乃於去年十月革命紀念日，發行「一九一七年」一書，痛罵齊諾維埃夫與加米奈夫等，謂他們與資產階級妥協；於是齊氏加氏便到處宣傳，謂托氏於列寧生存時所著「一九〇五年」一書，均想以托羅斯基主義代替列寧主義，同時齊氏又發動他所屬布黨黨部發表宣言，反對圖氏，主張驅逐他出莫斯科；而托氏乃致函全俄布黨中央執行會，表明他自己的態度，該函內容，共有八要點，大意在辯明他自己並不想以托羅斯基主義代替列寧主義，並願絕對服從中央委員會之紀律與委托之工作。但當時托氏雖表服從布黨黨部，並未自認錯誤，於是全俄布黨中央執行會議決，取消托氏的陸軍總長職位。於此，可知齊諾維埃夫反對托氏，並非真因理論上的衝突，而是地位問題。



## 予 欲 無 言 集

葉 紀 懷

五〇 蔣介石多才多智

此次渝方的「六中全會」，有一個威風凜凜的決議案，就是推蔣介石為行政院長。但不知此案真正是誰提出的。

說起蔣介石的權位，真夠威風！舉其尤者：有黨之總裁，政之院長，軍之委員長，經濟之四行總督，人民之最高領袖，還有四川小朝廷的皇帝；其他鷄另狗碎的名目，不說在下列舉不盡，恐怕連蔣介石本人也記不清楚。這一位席捲全國權勢的「英雄」，他的本質，若不屬「人中之瑞」，必然是「世間之魔」了。

我們舉述蔣氏的頭銜以為談論，原屬多事。蔣氏既是一個一手掩盡天下的獨裁者，即使不担任什麼「實缺」，一切「實權」還是屬於他的。他若非尚存「天下人豈不笑罵於我」之念，早會和趕走孔祥熙一樣把林森老先生趕走，率性以名實兩全的「元首」自任了。

於此我們不獨讚美蔣氏之多才，尤深深驚佩其多智！

五一 赤色禮服的故事

蔣介石任行政院長，而把孔祥熙擡

兄壓居偏位：我們對於此事還有一點小見解。原來，行政院長一席，孫科少爺垂涎已久，可是因為孫科在莫斯科與倫敦跑來跑去其游說特使時，虛報過不少荒唐可笑的國際消息，頗為蔣氏所不滿，所以孫氏之好夢也就難成了。但是，孫科是穿有「赤色禮服」的，孫科之不能輝煌騰達，直接影響到「赤色禮服」店老板的面子。共產黨便咕嚕起來了：「不教孫科來代表蘇俄，難道只管教孔祥熙代表英美就是對的嗎？」自然，蔣介石徘徊於英美與蘇聯之間，不敢得罪誰個；孫科雖然不長進，「赤色禮服」則不為不挺哪。

於是，孔祥熙便被壓倒，而只有由蔣介石本人騎在馬背的正中處了。

五二 歐洲與遠東

關於重慶方面「赤色」的故事，最近還有一件足述的：

不久以前（十一月十六日），重慶共產黨機關報新華日報，發表一篇警告美

國的論文，大意有三：一是教美國不必再顧歐洲，應把全力用於遠東；二是教美國對日本儘可強硬，不必顧忌，勿使日本在遠東樹立霸權；三是指責英法撤退華北駐軍之軟弱。——我們對於這篇論文的觀察如下：

蘇俄在歐洲利用英德的衝突，獲了一筆厚利，而且使英法德資本主義三大強國火併起來，直接削弱反共列強的能力。他如今又想把這種陰謀如法泡製的搬到遠東來。和在歐洲一樣，他想利用日美的衝突獲一筆東方的厚利，同時教日美兩大強國火併起來。他的作風，在技術上是絲毫未加改進。過去怎樣挪揄英法和怎樣鼓動英法，現在照樣用於美國；新華日報希望美國離開歐洲而以強硬態度對付日本，實在是莫斯科播音之下的一點餘響，其作用即在挑撥太平洋戰爭；而其引述英法之軟弱無能，更含有借題發揮以激動羅斯福的意味。可是另一方面呢？日蘇商務談判却又在偷偷摸摸的進行，那不又是和德蘇協訂的作用一樣嗎？

在重慶一角，在全中國，在世界，「赤色」故事的寫述中心都是如此的。

x x x